

忆建国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七千人大会”

曹 鄂

(原苏州丝绸工学院党委书记)

提 要

本文作者以自己参加会议的见闻和体会,追忆了“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对这次大会的历史作用、存在问题以及经验教训作了具体的阐述。这次大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对纠正当时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及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终使“文革”浩劫不可避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八届中央委员、后补委员,还有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大企业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同志,共约七千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建国初期,特别是1958至1961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这不仅对当时克服由于我党指导方针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困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次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对会议的精神,后来有些未坚持贯彻到底,有些反而背道而驰,而且越走越远。终于使“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不可避免,从这里可以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现将个人参加会议的见闻和体会回忆如下,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1 “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背景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开始的几年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对国情的认识不足,对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

本文于1988年7月15日收到。

题没有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因而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当时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过高估计了所有制改造对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过分估计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58年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在几年之内“超英赶美”，“提前过渡”，并在“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口号下，提出了难以实现的粮食和钢铁的生产指标，因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和“共产风”（简称“五风”）严重地泛滥开来。有些地方由于浮夸、高指标，把农民的口粮也当作公粮上缴；由于瞎指挥和强迫命令，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压制和打击；由于“共产风”，把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归了公，把集体经济无条件的改变为全民经济。严重的地方造成了饿死人、打死人、人口外流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已在下面产生了严重后果，但未为中央领导人察觉和引起重视，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开始有所觉察。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原准备纠正运动中“左”的错误，但后来把彭德怀同志对运动的正确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从此层层批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反映实际情况和发表正确意见的同志。这就堵塞了“言路”，使下情更不能上达，“左”倾错误和违法乱纪现象则愈演愈烈，灾难也愈来愈严重。

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时期，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要实事求是，说真话，不能剥削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等等正确的观点。同时，从中央机关抽调了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深入到问题严重的地区，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错误；并调运大量救济粮和药品到灾区，抢救人命，安排生活，恢复生产，建立正常秩序。这些地区的省、地、县各级领导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面向实际，向错误和困难作斗争。经过全党上下一致努力，到1962年，农村局面已基本稳定，各条战线贯彻执行了“八字”方针后，也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基本上渡过了三年（1959——196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2 “七千人大会”的经过和内容

“七千人大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得生动活泼，教育意义极为深刻。

会议一开始先将《刘少奇同志报告初稿》发给与会同志，这个《初稿》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同志建议先给到会同志评论、提意见。他对大家讲：“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该比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

《初稿》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以后发生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经验教训。大家在讨论中，集中地提出了以下问题：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是成绩主要的，还是错误主要的？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九比一），凡是把错误说成超过一个指头，就会受到批判。

——对造成错误的原因和责任问题。错误主要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上面要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要负主要责任？在“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时，较多地责怪基层干部，因此基层干部存在“怨气”。

——发动“反右倾”运动是否必要？因反映实际情况，说了真话的人，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可否实行平反？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否已完全克服？今后的任务是什么？

围绕以上问题，大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毛泽东同志一再动员大家把意见讲完，他说：“请你们来开会，就是让你们来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天三餐，二干一稀。”（中央和北京市委对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白天代表开会，晚上有名演员来演戏，伙食质量也很好，每天“二干一稀”，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优厚的了。）他又说：“大家的气，都出在北京，不要带回去，春节快到了，中央留大家在北京过年，把会议开好。”（会议原定春节前结束，后作延长，春节期间加了菜，开了二次文艺晚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与大家同乐。）毛泽东同志的话给大家极大的鼓舞，大家消除顾虑，开动脑筋，从各个角度提了许多意见。几年来压在心头的话，一涌而出，尽情倾吐，感到十分舒畅。大家都说，好象延安“整顿三风”的情景又回来了！

经过充分讨论后，会议组成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尽量吸收大家正确的意见，对《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第二稿》写成发给大家后，都觉得很满意。毛泽东同志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是中央常委同志向大会作报告。第一个讲的是林彪，他讲的中心内容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尝试，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付出代价的。譬如训练飞行员，可能会摔掉几架飞机，消耗许多汽油，甚至死掉几个人，这就是“付学费”嘛。

第二个作报告的是刘少奇同志。他说：“我代表中央要作的报告（第二稿）已经发给大家，这是与会同志的集体创作，在会上不再宣读，我只讲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关于成绩与错误的问题，少奇同志说：“对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有些地方成绩与错误可能是‘七三’开；有些地方也许是倒‘七三’，错误严重的地方，成绩可能被错误全抵消了。”他列举了山东省惠民地区，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严重错误，要大家“正视错误，认真对待，不要文过饰非。”毛泽东同志当场也插话补充，指出：“甘肃的酒泉、张掖、天水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

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说：“凡是说了真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提了意见，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律不算，都应平反”。但当时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未能完全澄清，说他还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第三个作报告的是毛泽东同志，他报告的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的报告讲

了三个半小时。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重要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同志说：“但是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或者别的什么式的，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原则。……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他又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就叫集中统一。”

毛泽东同志把那几年错误的根源，归结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他说：“这个问题在有些省已作了纠正，有些省是被迫作了检讨，有些省至今还未觉悟。在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指安徽省），会议本来开得生动活泼，但省委书记在那里一坐，就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书记同志你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大家议论纷纷呢？”他称听不得别人意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是“霸王”。他说：“不是有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对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把会议推向了高潮，他对“民主集中制”深邃、生动、坦率、恳切的阐述，给与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党长期革命实践中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后来，中央常委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同志先后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邓小平同志讲的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他特别强调了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这是由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他又说：“党的优良传统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批评自我批评的传统等。对这几方面的忽视和损伤，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这是全党值得严重注意的。”

朱德同志讲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周恩来同志作了大会总结，他综述了这次大会的基本精神，要求大家回去后认真传达，统一全党的思想，贯彻执行，身体力行，并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这次会议原安排中央常委各同志都要在大会作报告，八届中央常委有毛、刘、周、朱、邓、陈、林七位，六位在会上讲了话，但陈云同志未讲，毛泽东同志告诉大家：“陈云同志要求再作些调查研究后讲，这次大会上不讲了。”（这次大会以后，在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

3 “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作用和存在问题

前面说过，“七千人大会”对克服当时我党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以及严重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七千人大会”后全党贯彻执行了会议精神，各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 各级党组织传达了会议精神后,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自我批评的风气大为发扬, 各级党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总结了经验教训, 以“五风”为标志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 党内民主生活趋于正常, 党风有了很大好转。“七千人大会”的开会方法, 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原则, 直到今天我们党内外的重要会议还沿用这种做法, 事实证明这是充分发扬民主, 实现集中统一的好方法。

(2) 会议以后, 在党中央和各地方党委领导下, 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平反, 并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 调动了许多人的积极性, 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3) 周恩来同志, 陈毅同志在广州召开了会议, 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还向受到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表示赔礼道歉。

(4) 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 分析了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还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5) 在农业、工业、教育、科技等战线, 都总结了经验教训, 制定了各自的《工作条例》, 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七千人大会”后, 由于在政治上, 经济上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正确措施, 我国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从1962年到1965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5% 1966年钢的产量上升到1500万吨, 粮食产量接近21.5亿吨。

但是, “七千人大会”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未能解决, 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也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以后对会议的精神, 也未能坚持贯彻到底。

(1) 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的国情未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是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所以这次会议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只是初步的, 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会议重点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但对过高估计主观能动作用的唯意志论未进行深刻的批判。因此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特殊性就认识不足, 当然也不可能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2) 会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及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未进行深刻的分析。当时已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会议未引起重视, 更未能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正确的认识和处理。

(3) 对“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发起和发展未作全面分析和纠正。会议仍认为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是必要的, 而且又给他戴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未能平反, “反右倾”运动的错误也不会得到完全的解决。

(4) 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对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艰巨性、复杂性也认识不足, 对1960年以来纠正“五风”错误和实行“八字”方针的作用估计过高, 直到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 但在当时中央常委中未能得到统一的认识。

由于以上原因,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虽然是一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会议, 但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还未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严重的“左”的错误。这次会议未能真正找到产生错误的根源, 只认为是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未提高到思想政治路线上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1962年9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5年初,在“四清”运动中,他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个人专断的作风愈来愈发展,严重地违背了他自己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个人崇拜的现象也愈来愈发展,而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伺机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我党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肌体遭受了严重的损伤,人民遭到了严重的灾难。直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清算了我党社会主义建设中指导思想上一系列严重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七千人大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长达18年之久,其中有多少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啊!

Look Back an Important Meeting
in our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Seven Thousand Men Congress”

Cao E

Abstract

The autor of this paper looked back the situation of “seven thousand men congress” with what he saw and heard and expounded the history role and the problem of this congress from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his congress laid stress on insisting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on developing our party's fine tradition and played the part of possitive role in correct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mistake of our party at that time and in surmounting serious economical mistake. But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a great calamity” was not avoided because “Left” mistake was not corrected simply.